

从识字开始

杨肇林



1952年6月,我随海军政治部工作组去万山群岛外伶仃岛,学习和总结万(山)虎(门)守备团建岛工作经验。

24日早6时由北京前门火车站乘车,经36个小时,25日晚7时到汉口。长江隔断了铁路,乘轮渡过江,晚11时换乘继续向南,又经30多小时,27日早晨到达广州,全程3天3夜。一路上,我直觉得慢,叫人着急。人们想快,却快不了。这就是刚从旧中国脱胎出来,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历史氛围和人们的生存状态。如今,由北京去广州,高铁朝夕至,中途也无须换乘,与当年66个小时比,几乎可说是瞬间到达。

6月29日下午,我们再由广州乘小火轮经西江,夜间航行12个小时,到达石岐,也就是今天的中山。正值海上早潮,潮水涌进街,淹浸街道和码头。天刚亮,街上已熙熙攘攘。茶楼里吃早茶的,谈生意的,喧哗热闹。妇女挑着菜担子沿街叫卖,她们穿着香云纱黑色围裙,胸前是白线绣的花草,越发显得“黑里俏”。街的两旁有几栋新屋在建造,斧铧、拉锯声不绝于耳。生活节奏有紧有松,热烈红火。

从石岐到唐家湾团部还有五十里,没有公共汽车,我们分别搭坐在十几辆自行车的后面,由老手蹬车在沙石公路上飞驰。工作组领队、海军组织部边疆部长也没有例外,老乡自豪地说:“大军同志,莫小看了我这‘二等’!过去,到唐家只有羊肠小路,木轮牛车。解放了,修了公路,有了自行车,进步了!”

唐家湾,一个不大的渔码头,有一条石街,几家鱼货铺,进出万山群岛都须经由此地。你绝想不到,这就是今天珠海市的起点。石街中间,倒是有几家渔村的大屋,高墙,深院,厅堂,天井,十分气派。团部驻扎在一处渔村主的大屋里。走进团部,四处都是标语,字旁标有注音符号。部队正推广“速成识字法”。边疆部长称赞说:“这样好,便于同志们随时随地识字、学文化。你们响应军委号召,闻风而动,向你们学习!”

20多天前,1952年6月1日,中央军委号召全军指战员“向文化大进军”。动员的力度很高,依据指战员普遍文化程度低的实际,目标却很实在,“第一步扫除文盲,下一步就可使工农出身的同志粗通文字。当时不知道这是经毛泽东反复修改后发出的指示。早在1950年8月1日,毛泽东曾专就开展文化教育亲自起草文件,要求“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使军队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校”。上世纪80年代,我在海军档案室查阅到,1952年11月21日,毛泽东批阅海军副政委刘道生关于部队学文化的来信原件,信中报告:“各地机关、岛屿部队学文化学习是正常地向发展,形成高潮,到年底可完全消灭文盲。”毛泽东高兴地用红铅笔在句旁画了一道粗线,刘道生继续报告说:“先提高了文化再来学技术是方便得多,进步快。一批文化水平低的同志均系从陆军调来的骨干,不提高他们就无法贯彻以工农为骨干、解放军为基础的建军路线,就不能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海军。”毛泽东又在句旁画了一道粗线。有多少国务紧要大事摆在毛泽东案头,他却专拣此件审阅,对工农战士命运的关注,跃然纸上。

此时的中国,首先要解决几亿人的吃饭问题,而且,美国纠集16个国家的大兵压境,要把新中国“扼死在摇篮里”。但是,中国人按照自己的节奏,适时开展文化建设,规模之大,全民动员,史无前例。具有何等远见,何等气魄!

7月1日中午,我们乘“先锋”艇去外伶仃岛。“先锋”艇是一艘木壳巡逻小艇,原只在珠江内河航行,人民海军成立后的第一个战役中,为“服从革命需要”,“先锋”艇作为出海作战的主力舰艇,为解放万山群岛,立下赫赫战功。

海茫茫,雾漫漫,一阵铃声响起,外伶仃岛从雾里“钻”了出来。外伶仃,军用地图上的代号“二零零”,边陲小岛,由守备团第二连驻守。资料介绍:少有人烟,没有建筑物,应该只有茅寮、野战工事,但是,眼前却见整齐的码头、平直的石路、白色营房、圆形碉堡,远远超出我们想象。上岛后,战士们引我们到冲凉房,说道:“外伶仃的‘自来水’,尽管用!”

暑天海上航行后,浑身汗湿发粘,有淡水冲凉,没有什么比这更惬意的了,在四面是咸苦海水的小岛,几可说是奢侈享受!战士们把长长的竹子辟成两半,一节一节联起来,从山上引来泉水,长流不断。

三幢营房坐落在万绿丛中,四面通风,不算宽敞,但凉爽舒适。连长是“四野”的老兵,从白山黑水到天涯海角,用脚板丈量过大半个中国。他笑着说:“我们过去是‘灶王爷贴在腿肚子上——人走家搬’,海军可是修了庙才能够进菩萨,在海上保障战斗力,就要有阵地,有住处,有给养。”

营房,阵地,“自来水”,是他们披荆斩棘的最好诠释。

工作组和战士们同吃同住半个月,边疆部长作了《岛屿工作研究》总结,结束了调查研究,离开外伶仃。我留下来帮助连队进行文化教育,分配在一排三班。头几天夜晚,轮到我站岗,班长王兴业总是“带岗”,其实,他只是为陪护我。他向我说:“南下行军途中,走在前面的同志背包上挂着生字片,我一路走,一路学。一个字、一个字地‘抠’,好歹认识了自己的名字。我本来被挑去学飞行的,可惜,文化程度太低,刷下来了!”

他有点羞涩地说:“我老家在黑龙江呼兰河。我娘死得早,我13岁给人扛活,当‘半拉子’,只挣一半工钱。共产党来了,穷棒子翻身了,分地了,娶媳妇了,心里奔着‘三十亩地一头牛,媳妇儿子热炕头’,可是保卫翻身果实打老蒋也不含糊啊,炕头还没有捂热就参军了,从冰天雪地走到‘三个蚊子一盘菜’的南国海岛。我得赶紧学写字,把只能就着耳朵给媳妇说的话写给她。”我笑着说:“我包你一个星期就能够写信。你媳妇都等急了!”他满心欢喜地说:“嗯哪,那取情好。”

我想起了30年代作家萧红的《生死场》和《呼兰河传》,鲁迅先生说那是写出了“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力透纸背”。眼前这个汉子,不就是中国农民命运的缩影吗?

王兴业还说:“班里同志都想识字学文化,又担心学不会,信心不足。好比‘老牛掉在井里,有劲无处使’。你得帮他们把积极性调动起来。”

战士郭仁华,大军南下时参军的农民,班里年龄最大的一个,什么工作都抢着干,只是一听学文化就打怵,推脱说:“我脑子笨,学不会。我家祖辈都没有读过书,笔杆子在我手里不听使唤,我宁愿抡镐头,也不拿笔头!”

战士梁双,广东兵,新参军,嚷嚷说:“我吨(们)乡下人去外面‘捞世界’,做小生意,卖劳力,多挣巴拉,不认字,我不会算账,尽吃亏。识了字,就不会受欺负了!”

祁建华创造的学习方法,以注音符号为拐棍,帮助人们在很短时间里认识了几百个汉字。过去,儿童启蒙学习,要求熟读《三字经》《百家姓》,强识字,正读音,由熟读到理解。祁建华的方法发扬了这一传统。我在教学实践中,还发现战士们很难记住单字,但是,如果两个或几个单字组成一个词组,或组成一句话,就能记住了。这是成人和儿童学习的区别。战士们学会识字了,急于给亲人写信,却无从下笔,着急地问:“怎么写呀?”我告诉说:“你想说什么话就怎么写。”于是,“写信”一通百通。战士们欢天喜地地说:“我第二次翻身解放了!”

前沿海岛不安宁,外伶仃岛距离香港仅6000米,窃据香港的英国当局,每天都派飞机窜来低空侦察、挑衅。二连仅有几门山炮,一挺高射机枪,是二战时美国造的过时装备,自然是“运输大队长”蒋介石送来的。战士们只能靠常备不懈弥补不足。一有警报,不得不放下书本跑阵地,正在进行的文化课常常被打断。

港、澳“长期打算,充分利用”,以利于冲破美国封锁。现在,事发突然,是个个别偶发事件,毛泽东指示“大国从严,小国从宽,对葡萄牙可以宽大处理。”葡澳当局请澳门的中国爱国人士斡旋,设在中山县的边防第五局接待了他们。但葡萄牙人竟于28、29、30日连续挑衅,向拱北开炮。8月2日,边防五局奉命关闸封锁,断绝对澳门的供应。葡澳当局陷于惶恐。

我们在外伶仃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王兴业愤慨地说:“葡萄牙人是‘瘦驴拉硬屎’,不知道今日中国已经不是昨天的中国。殖民主义者只认得拳头,只有把他打趴下才会晓得‘马王爷长几只眼’!”

8月23日下午,葡澳当局终于派经济局长为代表到中国边防五局递交道歉书,表示赔偿中方损失,葡澳哨兵退至关闸拱门以内。

无独有偶,9月24日夜,从香港驶往澳门的客轮违规越过航线,为规避中国公安人员检查,加速逃逸。中南军区海军“Y-2”扫雷舰开枪示警,命它停船,将船带至垃圾尾岛海面检查,查获一名伪造人民币的罪犯。25日清晨,港英两艘军舰偷偷摸摸侵入垃圾尾海域,夹护客轮逃走。垃圾尾守军给予惩罚性炮击。第二天,香港报纸抵赖说,英国军舰并无侵略意图,只为掩护客轮离开,遭到垃圾尾中共军队4发炮弹轰击,3发击中军舰甲板。

这些事件虽属偶然,却是外部敌对势力仇视新中国的必然。蒋介石集团也趁势作乱。珠江口“六门”海面,历来海匪猖獗,匪首号称“大天二”,自诩上天第一,他第二。国民党特务与之相勾结,成为政治性海匪,以香港、澳门为渊藪,时时袭扰渔民和商旅。一天,得到渔民报警,王兴业带领三班借老乡的渔船追击,海匪驾驶帆船迅速逃进香港海面,依靠摇橹的渔船追赶不及。王兴业气愤地向我说:“我原想,仗打完了,就去经营那‘三十亩地一头牛’,可英国人、葡萄牙人就藏在眼前,台湾还有蒋介石,‘大天二’还在海上,这仗还没有打完!你帮我写个报告,要求上级发给机器船,一定要剿灭‘大天二’!”

我说:“你会写了,自己写呀!”

“怎么写呀?”

“把你刚才说的话写出来就是了。”

王兴业用多半天时间,写出了报告。战士们就是在这种频繁战斗中,坚持文化学习。战士们琅琅的读书声,让附近的老乡坐不住了,纷纷争先恐后参加识字学习。识字运动由军队推及到全民,当年就有5000万人脱离文盲状态,其深远意义,自不待说。毛泽东称赞祁建华是“名副其实的识字专家”,刘少奇称赞他是“当代仓颉”。经毛泽东举荐,祁建华从一个普通文化教员,被任命为以郭沫若为主任的中国扫盲委员会副主任,他的榜样激励我们向工农大众传道文化,奉献人民。1957年以后,祁建华受到不公正对待,在极端艰难困顿中,仍然依照毛泽东“文字改革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方向”的意见,针对流行的拼音方案的不足和缺陷,研究出“拼音新案”,并在身边群众中试验,证明了它的优越性,只是没有能够推广。经历炼狱般的磨砺,祁建华越显新中国知识分子不改初心的赤子之忧和颠仆不辍的坚强。

我在外伶仃3个多月,战士们叫我“杨文教”,到给我起了个浑名,直呼“羊羔子”。后来,我又转去更前沿的担杆岛和垃圾尾岛、娘鞋岛帮助战士和渔民学文化。离开外伶仃时,梁双和几个广东战士连夜捉了一条蛇,做了一锅蛇肉粥“犒劳”我,为我不认字,还把整条蛇皮翻转来穿在竹竿上晾干,送给我作纪念,我至今保存着。二连的同志集体为我请功。我既高兴,又惶恐。我回到北京后,写了篇通讯《在海岛上》,海军文化部李林副部长推荐给《新观察》杂志,主编打电话约我去编辑部,详细询问海岛战士的文化学习和生活,在《新观察》(那时是半月刊)刊载了那篇通讯。对新中国初期那场文化建设,从毛泽东到普通知识分子,无不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尽其所能,竭力而为。

以后许多年,我和王兴业、郭仁华、梁双一直互通书信。王兴业告诉我,他被保送海军速成中学,又进了军事技术学校,彻底放弃了“三十亩地一头牛”,成了海岸炮兵军官;郭仁华复员,回到荆州老家,带头办起了农业合作社;梁双也复员了,真的从商“捞世界”了,为国家贸易去世界市场打拼。他们都实现了华丽转身,他们命运的改变,从识字开始,从新中国那场“向文化大进军”开始。历史学家叙述新中国历史时,对于那场识字运动无论怎么估价都是不过分的。



这是渭北高原向陕北丘陵过渡地带的一处平缓高地,方圆2000平方公里,统称洛川塬。

春天的气候变化莫测。薄暮时分,当我们从阿寺村出发走向与后子头隔沟相望的塬畔时,天空骤然阴云密布,黄昏漫起,随着夜色加重,沟壑遍布的开阔塬面如同灯光渐次转暗的露天舞台,看去更其空旷、雄浑、苍莽。

塬下的深沟蒿草茂密,荆棘丛生。靠近沟掌的地方,一条羊肠小路从斜坡弯弯曲曲绕到沟底,又从沟底爬到对面后子头塬上,是学生上学、老乡赶集抄近道踩出来的。高专员说,这一带他熟悉,他老家就在对岸,多年没去了。高专员在行署领导中算是文化程度较高的,上过边区师范,能写会讲,工作有激情,有魄力,1970年修建王尧水库,作为总指挥,他吃住在工地,与各县抽调的数千民工一道,吃大苦耐大劳,

夜来风雨连清晓

王巨才

奋战两年,建成延安历史上第一座蓄水三亿方的大中型水库,缓解了延河下游生产生活用水,群众至今受益。虽是副专员,我们习惯叫他专员,略去“副”字,既是通行的职务称呼,也兼有尊敬的成分。许是看我“笔头子还行”又能吃苦,下乡调研起草文件总爱点名要我。

这次去永乡公社阿寺村,是为拜访李新安。这位50多岁的老农,解放前夕到河南灵宝投军,学会一套果树栽培技术,回来时带了200株苹果树苗,建起洛川第一个果园,家庭收入增加,日子越过越红火,引来乡亲们羡慕和政府的鼓励。在他带动指导下,上世纪50年代全县掀起大办果园的热潮,先后有50多个村子建起果园,成为有名的“苹果县”,李新安本人作为省地县和全国农民科学家、园艺家、劳动模范,受到毛主席和其他领导接见。只是后来由于单抓粮食的片面政策和“文革”破坏,洛川果业生产逐渐萎缩,被誉为“苹果之王”的李新安也变得籍籍无名。

高专员在行署分管农业。去年初,为摸索解决群众温饱问题的路子,他带领地区机关30多名干部进驻后子头公社,调查研究,抓点带面。当时的延安,粮食亩产145斤,农民年均纯收入不到70块钱,职工年平均工资也只有607元,属特困地区。1971年,周恩来总理得知延安街头还有盲流乞讨人员时,曾痛心地说:全国解放20多年了,北京这样好,延安那样,怎么样呢,我做了20多年总理,陕北没有改变,心里很不安,我们对不起延安人民,对不起陕北人民……这既是自责之辞,也不难听出总理对国计民生整体时局的深长忧思。我们进驻的后子头,地处城关,又在西延公路沿线,群众生活相当困难。好在现任公社书记车保成是一位经验丰富、敢作敢为的干部,此前在别的公社当过多年一把手,到后子头后,他提出一整套塬面修渠打井,精耕细作,提高粮食产量;塬下修建梯田,营造万亩果园,增加农民现金收入的规划。因其牵涉广,动静大,县乡两级拿不准与现行方针有无冲突,一时下不了决心。县委要我们把蹲点日记放在后子头,这亦是一个原因。

可以看出,惺惺相惜,高专员对车保成的方案是赞赏的。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调研、论证、动员,县乡村三级和工作队的认识基本统一,后子头公社万亩造林誓师大会明天就要召开。作为地区领导和工作队队长,高专员是一定要出席讲话的,为此我们已一起熬了好几个晚上,为给讲话充实具体鲜活的内容,使之更有说服力,他说,还是得见见李新安。凡事认真,是他一贯的作风。见面从早上开始,谈得十分投机。听了后子头造园计划,李新安如遇知音,从自己的曲折经历、经验体会到农村政策的利弊得失、群众呼声愿望,滔滔不绝一口气讲了半天。高专员问的也足够详细,果园如何整地,每亩栽多少株,产多少斤,卖多少钱,各个品种的优良特点,施肥、浇水、剪枝、疏果、防治病虫害等各个环节的注意事项,凡所关涉,几无遗漏。原说吃过午饭就离开,由于谈兴尚浓,李新安又翻箱倒柜要找寻早年编写的宣传资料,告别时已近傍晚。公社陪同的人见天色阴沉,怕会下雨,非得留我们住下来。高专员说:那绝对不行,这么重要的会,万一误事咋办!放心,走近路,用不了多长时间。说罢头也不回穿过公路朝对面的田间便道走去。

雨倒暂且没下,风却一路追随。这风,起初只如裙裾摆动风佩摇曳般窸窣窸窣从背后吹来,带着刚泛绿的麦苗和油菜气息,新鲜怡人。只是没多久,它突然毫无由来地烦躁起来,推推搡搡怒气冲冲从身边刮过,嘶声凄厉,寒意逼人。再后来,便真像被谁激怒一般,狂吼野啸左冲右突跌跌撞撞席卷而来,携土扬尘,折枝摧叶,大有排山倒海掀天揭地的气势,吹得人目眩耳聋,蒙头转向。所幸这风来得猛,去得也快,等我们相互搀扶走到塬畔时,也就余威渐消偃息鼓了。现在,无论如何得坐下缓口气了。高专员虽然精力充沛,毕竟也是五十大几的人了;而我,熬了一路的烟瘾此时也已忍无可忍。于是从裤兜摸出打火机,点燃早在指间捏来捏去的“金丝猴”(地产香烟)开始满脸惬意地吞云吐雾了。这当儿,高专员一直静静地站在塬畔,一会儿望望愈益厚重的云层,一会儿看看模糊模糊的沟底,表情不无犹疑。正当我通身舒泰点燃第二支

香烟时,身后猛地喊道,别抽了!快走!有雨!我立马起身朝后望去,果见一道隐隐约约的闪电从远方天幕掠过。而当我们刚下到沟边,随着一阵隆隆雷声从头顶滚过,猛烈的雨滴便噼里啪啦砸了下来。许是“蓄谋”已久,这雨也是来势汹汹,但糟糕的是,我脚下的小路看去倒是亮晃晃的,但糟糕的是,我脚上穿的是一双时兴的白塑料底棉鞋,走在上面不停打滑,没走多远就跌倒爬起连摔几跤,无奈之下,只好脱掉鞋袜一步一停向下挪去。高专员本已走到前头,见我战战兢兢哆哆嗦嗦的样子,又回头走了上来,将一截杨木棍子递给我当拐杖使,又换着胳膊,说不用紧张,“飘雨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现在已开始退云了,这雨不会太久,咱到底先避一避,别把身体冻坏。我低头一看,他那双千层底布鞋也早已灌满泥浆,挽起裤管的腿肚上,有明显被划擦出血的伤痕。

事有凑巧,快到谷底,左手坡面下还真有一孔破败的小土窑,不知是何年何月哪位拦羊汉的遗作,进去顿觉暖和多了。一边让我“抽你的吧”,一边连声自责:“都怪我,都怪我,遇事总着急。我说着急算什么毛病,总比应付差事敷衍塞责强。他长出一口气,说,也是,不急不行啊……说罢双手抱膝,盯着外面的雨丝,陷入沉思。我揣测,他此时又是想起毛主席1949年10月4日给延安的《复电》中所讲的,希望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

区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想起周总理1973年6月回延安时关于“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的指示和说过的“你们五年粮食翻番了,只要我不死,只要我不犯错误,我一定再来延安”。想起李先念、王震等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每当提到延安和老区群众时那种一往情深的眷念与牵肠挂肚的关切。因为这些都是在作报告或写文章时经常讲到的,每见情不自禁,热泪盈眶。

雨住了,风停了,上坡的路好走多了。上到塬畔一看手表,12点一刻,高专员说,现在离城还有五里地,看来只能在大姐家歇脚了,不远,就在前面村子。叫开门,点亮灯,专员的大姐满脸惊讶,责怪道,不要命啦,这么大的雨,黑天半夜,怎敢过沟来着,自个儿不打紧,同事有个闪失咋给组织交代……专员连忙拦住话头,别啰嗦啦,赶快打搅团,最好再蒸几个杂面窝头,有客;你先做,我得到前炕上歇会儿。刚躺下,又朝里喊,记着,明早7点必须走!毕竟是弟弟,50多岁了,在老姐姐面前总还要撒撒娇。

这一躺就躺到日头冒花。姐夫说,见你们睡得王朝马汉,嚇里震道,你姐没让叫,别误事吧,我看看,说没有没有。再看后炕头,昨晚进门脱下的外衣都已烘干,两双鞋子还在灶火口烤着,旁边放两副棉毡鞋垫,原来老两口整宿没睡啊。抹把脸,吃过饭,高专员一声“走啦!”便径自出了院子。

雨后的高塬碧空如洗,和煦的晨光里,田野村庄俱有喜意。通往誓师大会现场的各条道路上,后子头各队的社员正掂着锄头铁锨匆匆前行。在乍暖还寒的季节和阴晴不定的气象中,这似乎是一个人们内心怀有某种希冀和期待的时节:

1975年,农历谷雨。人们说,倒春寒过去,气候该慢慢转换了……

2015年金秋,应邀参加国家农业部和陕西省政府主办的第八届“中国陕西(洛川)国际苹果博览会”。乘车从西安出发,一进入洛川地界,公路沿线,塬上塬下,视野所及全是大片大片的果园。地头和路边新摘的苹果海量堆积,红艳艳分外耀眼。到宾馆,翻阅会议资料,里面介绍,洛川苹果年产70多万吨,销往全国28个省市和亚欧20多个国家地区;全县农村人均纯收入15000元,16万户果农家修了新房,买了小汽车,年收入都在二十万元以上,多年没回延安,如许见闻,如许情景,感慨万千!随手写了两则俚语,以记感念:应是秋风醉晚霞,红遍川塬廿万家。异香盈袖君勿疑,枝头鲜果妍如花。又:犹记挥汗斩荆棘,也曾茅庐问桑麻。当年种树人何处,李歌不辍思无涯。

我想到的当然不只是李新安和高专员。那些在困难年代不避风霜霜苦,不畏艰难险阻,为国家前途人民福祉在一起殚精竭虑不懈奋斗,并言传身教给我以指导帮助的所有领导、同事、乡亲,我都永远感念。高专员已去世多年。1995年我调北京不久,他在国际广播电台工作的孩子找我,说父亲病危时有过叮嘱,去世后要我书写墓碑。感旧之情,一至于此。在反复斟酌思虑之后,我是流着泪水完成这个任务的。这次博览会上遇见当年一起蹲点的朋友,提到那次风雨夜行的事,都说那真是够冒险的,搁现在,大不了打个手机,报个警,但那时延安不少乡镇还没通公路,多数乡村不通电,所谓耕地靠牛,照明靠油,通讯靠吼,交通靠走。如此一想,这几十年的发展变化,真可谓日新月异翻天覆地了。

很长时间我都在想,历史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正如江河行船,只要驾驭有方,风正岸阔,那么“朦瞳巨舰一毛轻”,无论什么样令人惊叹和羡慕的速度,奇迹都是可能的,都不奇怪。